

在车窗被轻叩的刹那,在信息穿越心防的瞬间,我们都在共同学习一门永恒的功课 从“信息传递”到“意义共建”

□ 郑金雄

元旦午后,上海外滩的车流凝固成一条金属长龙。我们的网约车是其中微不可辨的一节,每分钟只能向前蠕动些许。车窗外,东方明珠塔在冬日的薄阳下静静矗立,与地面的凝滞形成某种无声的对比。

就在这近乎停滞的时刻,侧窗被轻轻叩响。

一位约莫五十多岁的交警俯身站在车旁。他两鬓微霜,眼角有常年户外工作刻下的细纹,荧光执勤背心下是笔挺的制服。他的动作有种不急不缓的沉着。

“打扰一下,师傅。”他的声音透过车窗缝隙传来,平和清晰,“后排安全带系一下。”

我和同伴这才意识到,在拥堵带来的松懈感中,我们都忘了这件事。车窗完全降下,交警让我们报了身份证号码,将信息输入手里的执法仪,打印出一份材料递给我们,说道:“这次是教育和普法,不罚款,请确认签字。”

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,在静止的车内异常清晰。我签下名字时,心中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——不是愤怒,也不是委屈,而是一种奇怪的,混合着尴尬与反省的触动。

烦躁背后的心理学

车子再次缓缓前移,交警已转身走向下一辆车,他的身影在停滞的车流间从容移动,一次次俯身,一次次轻叩车窗。我靠在后座,回想刚才那不到3分钟的互动,究竟发生了什么?为什么在签下名字的瞬间,会有种莫名的被“捕捉”感?拥堵的路段、焦急的心情、被打断的思绪——当交警的身影出现在窗外时,我升起的一个念头确实是轻微的烦躁。“又是检查”“这种速度有必要吗”“马上就到了”……这些念头在脑中快速掠过,像本能的防御机制。

然而那位交警的态度如此平静专业,没有训斥,没有说教,只是陈述事实,执行程序。正是这种专业,让我的烦躁无处落脚,反而转化为对自己的审视:为什么一位平和执法的交警,一次善意的教育,会在拥堵的烦躁之上,又添了一层微妙的心理波澜?我为什么不系安全带?是真的认为没必要,还是长期的习惯性忽视?

我想起传播学中的“认知负荷”理论。在拥堵路段,人的注意力资源本就紧张——要关注前车动向,要忍耐等待的烦躁,要估算可能迟到的时间。这时任何额外信息的介入,都可能被视为负担。那位交警的普法行为,在物理时间上选择了“车停着”的时刻,在心理时间上却撞上了“心乱着”的状态。

普法者设想的可能是:“既然你们走不了,正好了解安全知识。”而被普法者感受到的却是:“正因为走不了,我更焦虑何时能走,没心思看别的。”这种错位,让再重要的信息也难逃被边缘化的命运。

更深层的是心理学上的“心理抗拒”。当人们感觉自己的自由被威胁时——无论是行动自由还是接收信息的自由——会产生一种恢复自由的动机,表现为对威胁源的抗拒。按下车窗、配合登记、签下名字,这一系列动作在拥堵带来的行动受限

之上,又增加了一层心理上的受限感。

为什么“好信息”难被“好接收”

然而,这次经历真正引发我思考的,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:为什么好的心意、重要的提醒,常常难以被好好地听进去?

现在想来,首先是“时候不对”,在那个被堵得动弹不得的时刻,任何递过来的东西——哪怕是一张提醒安全的纸——首先传递的信号是:“你需要停下来处理”,可我们心里最强烈的念头只有一个:“什么时候才能走?”教育出现的方式和我们当时情境里最迫切的需求之间,有着最直接的矛盾。一张纸、一句话,本意是关心,却因出现在一个焦虑的当口,反而成了另一层负担。

其次,是“心不在此”。人在压力和烦躁中,其实很难进行深度的思考和判断。那时我们不太可能被长篇的道理说服——我们只会凭直觉,凭眼前最直接的印象来反应。理论上,交警的年紀、制服的权威、普法的严谨,这些本该增加信息的可信度,但在一片鸣笛、拥堵和等待的混乱中,这些细微的“印象”也被淹没了。信息还没进入大脑,就已经被情绪过滤掉了大半。

更要紧的是,我们仿佛在“各说各话”。普法的人,往往带着“我来告诉你”的视角;而坐在车里的人,那一刻的身份并不是“学生”,而是“急着赶路的人”。一方想传递知识,另一方只想解决眼前的困境——两套话语,两个关注点,如同两条平行线,很难真正交汇。这种角色与期待的错位,让沟通尚未开始,就已步履维艰。

所以,问题或许不在于信息本身不好,也不在于传递者没有诚意,而在于我们是否在对方能够聆听、愿意聆听的那一刻,用他能够接受的方式,说出了那句真正重要的话。

寻找“可教育时刻”

这让我开始思考:真正有效的普法,究竟需要怎样的时机?

元旦外滩的叩窗声,不仅是一次普法教育互动,更映照出普法工作中那个普遍存在的核心矛盾:传播者怀抱至关重要的信息,真心传递;而接收者却因具体情境与当下心境的错位,往往将其感知为一种“打扰”。这声轻轻地叩响,由此叩问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:如何让关乎生命的安全知识,穿越日常的喧嚣与个体心理的天然防御,真正融入人们的行为自觉?

探寻答案的钥匙,或许正隐藏于一场根本的理念转变:从“我要告诉你”的传播者中心范式,转向“你可能需要知道”的受众中心范式;也在于对于那些悄然开启的“可教育时刻”,进行精准的识别与智慧的把握。

有效的普法方式,在于从“我要告诉你”转向“你可能需要知道”的理念转变。这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最有效的普法时机,并非我们“有空”,而是受众心理“需要”甚至“敞开”的“可教育时刻”。“使用与满足”理论告诉我们,当普法精准契合人们的内在需求时,才会从“外部干扰”转化为“主动寻求”的信息。

这样的时刻往往镶嵌在生活情境中:如车辆驶入高速公路匝道,一句“请全员系好安全带”的导航提示或路边的醒目标志,正中人们对“高速安全”的即时功能性需求。又如,网约车行程开始前,手机界面自动弹出的简短安全须知,是服务流程的自然一环。这个时候,普法与行为启动深度绑定,完成了从“要我做”到“我需要做”的心理转换。当个体处于学习状态时,其接受度最高。

驾校培训是塑造安全观念的黄金期,通过模拟实验、案例分析进行深度学习,能从根源建立认知。此时普法,事半功倍。当风险感知被触发,它也就成为行为改变的催化剂。

处理轻微交通事故后,当事人对风险最为敏感,执法人员一句“幸好系了安全带”的现场点评,警示效果极强。当媒体报道相关事故,公众会在关注与唏嘘中产生了解原因、寻求安全的自发欲望,此刻以案普法,正切中其风险认知的需求。当关怀在关系中传递时,家人出行前一句“安

全带好系好了吗”的叮嘱,承载着爱与关切,远比外部宣传更易入心。

正确的时间与正确的方式

这位在元旦车流中穿梭的交警,他的身影代表着一种值得尊敬的坚守。然而普法工作更深层的挑战,或许正蕴藏于从“信息传递”到“意义共建”的范式转变之中。

真正的普法,从来不是单向告知“法律如何规定”,而是帮助人们在具体的生活点滴里,理解“这为何与我有关”。它需要回答的,从来不是冰冷的条款文字,而是这条规则如何守护我们珍视的生活,在乎的人。

普法如同在民众心中播种,我们精心挑选种子,更需寻找适宜的时节与土壤——在心灵最松软的时刻落下,在需求刚刚萌发的角落生根。

或许有一天,普法比智能导航更懂得:不仅要清晰指引方向,更要理解行路人的节奏与心境。在最适合的时机,以最自然的方式,给出恰到好处的提示。到那时,重要的安全知识将不再是被抵触的打扰,而成为被期待、被信赖的陪伴。

那时,执勤臂心上“交警”二字,更能超越制度的符号意义,化为人们心中安全感的代名词。而通往这里的每一步,不仅需要执法者的尽责,更需要对人性需求的深刻体察,对传播规律的理性遵循。

这次外滩的停车、叩窗与对话,记录的不仅是一次免于处罚的警示与普法,它更像一面微小的透镜,让我们窥见:每一次善意的规则提醒与每一次个体的理解接纳之间,存在着怎样细腻的通道。

在车窗被轻叩的刹那,在信息穿越心防的瞬间,我们都在共同学习一门永恒的功课——如何在保障公共安全的必要约束与尊重个体自由的珍贵空间之间,找到那个让文明得以生长的、微妙的平衡点。

而那声清脆的“咔嚓”,便是这平衡达成时,最美妙的回响。

(作者系厦门大学法学院、新闻传播学院教授)



鲍西娅的法律陈词为何成立?

多想一点

□ 刘星

从法律角度看,《威尼斯商人》里的著名桥段,无疑是第四幕第一场的“割肉不能流血,不能多割或少割分毫”。其中,鲍西娅扮成法律博士,面对夏洛克的步步紧逼、针锋相对,说道:“契约写得明白,法律准许你割肉;但你只能割下一磅肉,不能流血,也不能多或少。”

看过这出戏剧的人都知道剧情:夏洛克和安东尼奥签约,后者向前者借钱;如到期未能偿还,后者有权在前者胸前割下一磅肉。安东尼奥的确违约,因此,在威尼斯法庭上,夏洛克要求依约割肉。很多人认为安东尼奥求情;主持法庭的公爵,包括鲍西娅,也都提到夏洛克可否仁慈一些,在法律上做些让步——但夏洛克执意割肉。关键时刻,鲍西娅拿出了上面陈词。夏洛克惊呆,觉得自己已坠入深渊。

在社会评论以及法学史上,这一桥段是桩公案:盛赞鲍西娅者有之,痛斥者亦有之。痛斥者认为,那是诡辩,不是智慧。19世纪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曾提到,一位观众看到夏洛克哑口无言时,大哭,说这是诡辩,甚至是陷害。耶林自己也指出,现实生活中,不可能有人提出“不能流血,不能多或少。”

显然,没有人会怀疑:在活体上割肉时,流血和多点少点是必然的,那么这就引出一个问题——为什么在看第四幕第

一场时,很多人被鲍西娅的陈词所折服?不要忘记,从文学叙事角度看,第四幕第一场的法律桥段,是《威尼斯商人》喜剧成功的关键:如果夏洛克动刀了,安东尼奥死去,鲍西娅和巴萨尼奥的皆大欢喜结局,势必成为尴尬的笑话;反过来,认为《威尼斯商人》是喜剧,而且不是错的喜剧,那就不得不承认,鲍西娅的陈词的确令不少人可以信服。

要害在哪?注意莎士比亚的法律情节的安排。

一、夏洛克和安东尼奥签约后,很快就拿去做了公证。这表明两人视契约为真实意思表示,而且准备认真履约。

二、安东尼奥的商船覆灭,他知道自己无法履约,心生哀叹。这表明安东尼奥知道契约的约束力。

三、夏洛克逢人便说准备在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,显现复仇决心——因为曾被安东尼奥多次羞辱。这表明夏洛克对契约的效力深信不疑。

四、巴萨尼奥愿意替安东尼奥数倍还债。这表明,作为安东尼奥的挚友,也觉得悲剧不可避免,因为契约效力无法撼动。

五、法庭上,公爵提到,夏洛克能否展现大度,允许以其他方式来解决违约问题;但夏洛克绝不退让。这表明,公爵明白契约无法推翻。

六、法庭上,鲍西娅说,夏洛克能否仁慈一次,不按契约执行。这表明,鲍西娅同样认可契约的效力。

七、当夏洛克一再要求动手,痛斥如果不能履约,就让威尼斯法律去见鬼时,

鲍西娅大声说,威尼斯是讲法治的,任何人不得违反法律、推翻契约。这表明,鲍西娅强调了契约和法律的严肃。

八、鲍西娅问夏洛克,为什么不找外科医生做好准备,在割肉流血时救活防止死亡;夏洛克回复说,契约上没有找外科医生的规定。此外,夏洛克自己嘀咕,应在心脏位置还是心脏附近动手,随即想起契约上写了“心脏附近”,这表明,夏洛克“严格执行契约”的所有想法,最终是以“契约字面规定”为基础。

现在注意:情节由前至后铺垫至此,很多观众会自然而然觉得,严格执行契约已无悬念;预期重点,转向了能否灵活执行,超越契约文字。仁慈劝说,提出别人可替代偿债,包括提到找外科医生做好准备,都在契约约定之外。这里思路的逻辑预设,逐步定格在“契约文字是关键”。

更要紧:如果认为契约文字是关键,必须拘泥于文字,那么,在契约文字上做文章,就是顺理成章的。契约有违约割肉的文字,没有可仁慈、可他人代偿债、找外科医生的文字,而夏洛克据此拒绝——这在其逻辑中,无懈可击;但同样,契约也没有可流血、可多点少点的文字,包括死亡风险,所以,夏洛克同样必须拒绝。因此,当鲍西娅提到上述陈词,夏洛克惊呆,理屈词穷,合乎剧情逻辑。也因此,当鲍西娅继续说,“你要公道,给你公道,而且比你想要的还要地道”,很多人便会觉得,“割肉不显勉强,反而是格外有力的。

认为“割肉不能流血”是诡辩的人,包括法学家耶林,他们的问题出在什么



□ 李佳

张艺谋导演的谍战片《惊蛰无声》似乎并不典型。作为今年春节档影片,其格调稍显沉郁,看似与喜庆氛围不搭,却能引发人们对于时代主旋律、家国关系等的深层思考。正如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,张艺谋所说:“今天的岁月静好,真的是有人默默地负重前行。这样一种感觉也许和春节是有关联的。”

以具象化的“牺牲”引人深省

影片讲述了重要国家秘密面临泄露风险,国安小组奉命调查,其间不仅对手很棘手,更得到线报——小组内部可能已被渗透。一时之间,敌暗我明,敌我难辨,形势波谲云诡,一波波较量暗潮汹涌。这不仅是一场关乎国家安全的战斗,也是关乎底线的较量,既考验智慧、能力,更考验忠诚、人心。

电影主题鲜明,紧紧围绕着国家安全展开,以国安工作人员为主人公,无论是任务线,还是冲突线,皆铺设在国安小组之中,使小组成员经历与敌手、与家人乃至与自己的交锋,展现了隐蔽战线不为人知的一面。不仅如此,该片将时间“坐标”放置于当下,大量呈现了无人机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手段在交锋中的应用,这在谍战题材影视剧中无疑颇具开创性。

所有这些,都揭示出在守卫国家安全的战场上,虽然不见硝烟,斗争却十分残酷。片中以各种“牺牲”将这种残酷性予以具象化:于国安小组内部,有在追捕现场被冷枪夺走的生命,有被长期冷落、只能默默垂泪的家人,有纵然被怀疑也要配合调查的委屈,有置个人名誉、利益等于不顾的长期潜伏、隐忍;于国安小组之外,更有一旦卷入泄密事件,随时可能被牵连的普通人,乃至国家秘密一旦泄露,随时可能造成损失的国家利益……这些“牺牲”,有的肉眼可见,有的不可见;有的在瞬息间发生,猝不及防,有的则可能长期蛰伏,慢慢侵蚀;有的可以言,有的不能言;有的可以计数,有的难以估量。但无论哪一种,都是和平年代,大多数人所知甚至未曾想及的。

当今时代,与过去的数个世纪相比,最鲜明的特点之一是:以长期和平为主旋律。身处其中之人,容易把安全视作理所当然,而未曾奸奸思考安全如何得来、是否存在隐忧,如何捍卫安全等问题,这也使得这些问题日益凸显。该片正是用具象的“牺牲”引人深省,以斗争的残酷激发危机感,以切近的故事让更多人意识到: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无时、无处不在。

以生活中的风险敲响警钟

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中,“危害国家安全罪”被致于分则第一章,这有着强烈的宣示意义,即保护国家安全是政治底线和最高法益。纵然如此,普通人对此的关注度和理解度却并不高,在大多数普通人的观念里,危害国家安全行为与寻常生活相去甚远,类似间谍、渗透、泄密等皆与己无涉。

影片最难得的是,以凡人视角讲述故事,将一场惊心动魄的谍战置于寻常生活,与所有人都建立了若隐若现的关联。影片不慌不忙地安放悬疑点,令其缓缓发酵,这场没有太多动作戏的谍战,几乎处处有伏笔,步步如履薄冰。

所谓“惊蛰”,其实有多重含义,不只是国安小组的行动代号,也是间谍组织的行动策略。如,女间谍白帆(杨幕饰)和副队长黄凯(朱一龙饰)的几场对手戏,看似不经意,但看到最后,观众会发现,每一次都经过间谍组织的精密设计,白帆于其间步步为营,利用一次次接触,将黄凯逼到“悬崖”边缘,使其不得已做出选择,采取行动,进而从蛰伏、摇摆走向自我暴露。这些悬念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慢慢释放,以至观众观影时,神经可能总是紧绷的。

影片至少设置了五组“矛盾点”,涵盖了敌我之间、同事之间、泄密者和窃密者之间、情人之间、家人之间,并由此渗透出丝丝缕缕的危机。大学时交往过的女友,很可能是来自间谍组织的渗透;家门口“偶遇”结识的情人,很可能是对手处心积虑布设的陷阱;并肩战斗的兄弟,很可能有一天将枪口对准自己;朝夕相处的同事,很可能突然间变得陌生、莫测;就连普普通通的闪送员,派送的单子都可能暗藏正在泄露的国家机密……当影片像讲述寻常故事一般,将这些幽微隐秘呈现在观众面前时,无异于振聋发聩,为所有人敲响了警钟,让人意识到:危害国家安全相关犯罪距离我们并不遥远。

以克制的心理战探秘人性

张艺谋导演是公认的“光影大师”,擅运用高饱和度的色彩与戏剧性的光影互动。然而,让许多看过《惊蛰无声》的观众不解的是:似乎从中并未看到熟悉的“张艺谋”,影片并没有先声夺人的光影效果。综观影片,大量运用了蓝、灰色调,以无人机俯拍场面和特写画面相互映照,并用大量的跳切镜头替代了更具叙事连贯性的“长镜头”呈现,故而始终有种令人压抑、不安的氛围。

而这恰恰呼应了影片的主旨,正是一次次紧张的心理较量,撑起了这部动作场面并不多的“谍战片”。与以往以“年代戏”为主的谍战影视剧不同,这部电影聚焦当下,既有充满时代性的鲜活呈现,也有着眼深度思考的人性探析,而后者是一切矛盾、冲突的源起;也是所有危机、转折的动因。片中埋设了大大小小数次反转,情节围绕“钉子”是谁、如何抉择,最终鹿死谁手等焦点,不断拉扯,并在关键之处发生突如其来转变。这是影片自身所“蛰伏”的元素,也是“惊蛰”的另一重内涵。

而所有的反转和意外,皆来自于人性的莫测;对于人性的书写,是该片最引人入胜、值得反复品味之处。间谍组织寻找和策反对象,靠的是对人物的精准拿捏。工程师李楠(雷佳音饰)人过中年,长期处在基层,收入不高,家累不少,还想着把女儿送出国培养,所有这些“人之常情”,成了他最薄弱的软肋,也是他遭受围猎的突破口。而他与间谍组织接触过程中的急躁和天真,也恰恰符合他埋头科研、不谙世事的特点。片中最有看头的人物,是身处灰色地带的副队长黄凯,片中有大量他的独处镜头,夜不能寐的煎熬,踽踽独行的身影……所有这些,都是他内心正在发生的激战。他并不甘被拉下水,曾多次试图补救,奈何对于对他太过了解,每一次都精准设下陷阱,他的流泪、崩溃、欲言又止都牵动着观众的心,而他最终的孤注一掷,让人瞠目,亦扼腕叹息。

正如影片插曲《猎物》所唱:“谁是谁的猎物,谁又被谁跟踪。”间谍组织“螳螂捕蝉”,国安小组“黄雀在后”。对于队员的性格、行动和选择,国安小组尽在掌握,对于间谍组织的处心积虑,他们亦有所准备,“棋高一着”。反观间谍组织内部,那些正在围猎别人的人,又何尝不是别人的棋子?步步为营的白帆何曾想到,自己早已身临险境?每走一步,都向着万劫不复的方向,最终难逃“弃子”的结局。

在故事的推进中,复杂的人性被一层层拨开,人的阴阳两面也渐次呈现。银幕前的我们,作为“局外人”,既看见了阳光,也看见了深渊。而生活中的我们,又岂知在不在“局中”?影片的余味,恰在于此。可以说,作为国内首部当代国安题材电影,《惊蛰无声》只是一个开端。



图为电影《惊蛰无声》剧照。